

中国的美学、哲学和中西文化对话是我终身研究与兴趣所在

——卜松山 (Karl-Heinz Pohl) 教授访谈录¹

访谈人：金美玲

时间：2012年12月10日

地点：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整理：王意鑫

翻译：金美玲

问：卜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汉学的?

答：我是1970年在汉堡大学开始学习汉学的。当时师从于刘茂才先生，我的老师还有关

愚谦和赵荣朗两位。我的三位老师都是中国人，我非常尊重他们，崇拜他们。与关愚谦我现在还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刘茂才、赵荣朗两位老师可惜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了。

问：那时候的学习是以当代汉语为主还是以古代汉语为主?

答：两方面都有。我们首先要学习现代汉语的语言，同时也跟刘茂才老师学习古代汉语。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课，他讲古汉语的方式很鼓舞人。赵老师和关老师给我们上现代汉语，他们教得也都非常好。在讨论课上，我们讨论的题目既涉及现代中国，也涵盖古代中国。

问：您是怎么想到要学习汉学的？在您的家庭或者朋友圈中，有没有人影响您或者鼓励您学习汉学？

答：在中学的时候，中国的一些东西就开始吸引我，首先是佛教的禅宗。在我还上中学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得到了一本 Alan Watts 的书，书名叫 *The Way of Zen*，这本书令我非

常着迷。直到现在，禅宗对我的吸引一直未减。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林语堂的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艺术》，这本书非常成功地介绍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描述了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和处事哲学。就是这样的东西，促使我放弃了已经开始学习的地球物理学专业，改学汉学。

问：在德国的中学，学生就得读这样的东西吗？还是这只是您的兴趣？

答：在中学，有关中国的教学内容几乎没有。那只是我自己在课余产生的一点儿阅读兴趣。当然，现在中学的教科书中也出现了中国。但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中国还完全远离我们的视线。

¹ 标题为收入此书时所加。因篇幅有限，收入时访谈录有所缩略。全文请见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

问：您家中有任何兄弟姐妹学习汉学或者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您多大开始学汉学？

答：没有。我那时应该是 25 岁。

问：您开始学习汉学以后是非常高兴自己选择了这个专业，还是您发现汉学并不那么有意思？

答：促使我学习汉学的还有一个原因。我曾经在近东和北非地区旅游过半年，我到过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这些国家，这使我想认识、了解其它文化的愿望更加强烈。这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也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欧洲以外的其它文化。这些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生活跟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这也促使我放弃理科，而改学文科，当然我选择了中国文化。选择汉学专业，我一天也没有后悔过。对我来说，每学习一个汉字，都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一种全新文化的小窗。我学的时间越久，对它的好奇心就强。

问：这个专业当时在德国吃香吗？

答：并不吃香。那是 1970 年，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的许多同学、同事那时都是

受政治的影响，受毛泽东等人的影响而选择学习汉学的。当时正是“六八”学生运动时期，所有的大学完全掌控在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分子手中，但是我的学习动力不在此。我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文学、哲学一类东西感兴趣。我们班那时有 20 个学生。

刘

茂才教授曾提醒我们，不要幻想将来毕业以后能在本专业找到什么工作。

问：但是您还是继续坚持学习汉学，不但找到了工作，而且还这么成功。您刚才说到六八学运，它是否对很多年轻人产生了影响，继而对中国感兴趣？

答：当时流行一本书，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他曾在延安拜访过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本书中他非常正面地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当然也促使很多学生对产生好奇。但是不能说这就是当时真正的趋势，当时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并没有多到这种程度。

问：您第一次去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答：我是 1975 年去台湾的，呆了大概一年零六个月。我首先去了新竹，那里有辅仁大学

的分校，当时叫汉语研究所，是耶稣会传教士的培训地，但是他们学校也对其他人开放，比如学汉学的学生等。那时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人很多，很热闹，也很愉快，我非常享受那段日子。那时我的妻子也在那里学习汉语。当时她还只是我的女朋友。她在台湾呆了两年，我当时患了肺炎，必须回家养病，只呆了一年半就回德国了。最后那段时间我在台中找到了一份小小的工作，在逢甲学院教德语。

为了完成大学学业，我回德国后到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那时，乔伟教授是我的老师，他是我的第四位中国老师。我也非常尊敬他，只是师从于他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我就大学毕业了，拿到了硕士文凭后我去了加拿大，那是 1977 年。在那里我在一年

之内做完了硕士，之后又读了四年的博士，获得了博士学位。

问：您是在加拿大做的博士？

答：是的。那里的博士学习是一个正规的学习，我必须先上两年的课，然后再参加一种被称为 Rigorosum 的博士学位的口试，最后再有两年写博士论文的时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大陆。1981 年我拿到多伦多大学的奖学金，去中国留学，在南京呆了两个月。此时，我已经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郑板桥的。其实，这个题目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基本有了。在台湾我给在汉堡的刘茂才教授写信，问可不可以将郑板桥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题目，当时我还没想到有朝一日要攻博。他说，当然可以，郑板桥不仅是诗人，也是书法家和画家。这样我就更觉得他有意思了。于是，我在台湾就开始关注郑板桥，搜集有关他的资料，翻译他的东西，在多伦多也同样。1981 年到中国以后，我开始追寻郑板桥的足迹。我参观了郑板桥到过的城市，山东潍坊是他做过官的地方，扬州是他度过大半生的地方。

问：您刚才提到，您很尊敬您的老师。这些老师肯定对您也有很大影响吧？

答：那当然，影响非常大。我的老师们可以说都是榜样人物，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君子。他们的品行值得人们敬仰、钦佩，刘茂才老师是这样，赵荣朗、关愚谦也是这样。只是关先生更活泼一些，他现在虽然已经 80 岁了，但是依然很活泼、活跃。乔先生也同样如此。这些老师都深深影响着我。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汉学领域工作的？

答：那是我做完博士论文之后，也就是 1982 年。我在加拿大已经呆了五年，当时我的父

母年龄已经大了，我和妻子想，回德国也许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当时还没有具体的目标，只是一个随意的决定，没想到却做得很值得。在德国，我很快就在维尔茨堡找到了一个教授助手的位子，我跟当时的教授并不认识，能得到那份工作，完全是出于幸运。在维尔茨堡我一干就是 5 年，做研究员、教授助手。这时候我开始发表论文、写书，跟我的学生一起翻译陶渊明的诗，然后出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虽然很薄，但我却非常自豪，因为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及思想史上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

问：作为研究员，您一定也得上课，您所上的课是哪个方向的？

答：当时：我首先必须给学生上文言文，古代汉语，另一方面我也要上有关现代文学的讨论课。我在维尔茨堡的老板是石泰宁（Steininger）教授，他对道家思想非常有研究，他只讲授中国古代的东西。但那时候的学生当然也对现代中国感兴趣。我做学生时学过古代和现代的东西都学过，对两方面都比较熟悉，所以我也跟学生讲现代、当代的东西，比如现当代文学，现当代历史等。我认为，一个完整的汉学专业必须这两方面都要兼顾。我当时这样做，也很受学生欢迎。

问：您在维尔茨堡大学做过科研助理，在那以后您在哪里工作了？

答：我从 1983 年到 87 年在维尔茨堡工作。在此期间，我申请过不同的教授位子，但都没
有什么结果。后来在图宾根有一个 C3 教授位子，我申请了。他们竟然邀请我去做报告，这当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当时我正在翻译一本有关文学理论方面的书，是清朝文学理论家叶燮的书，名字叫《原诗》，就是“诗的起源”。于是我就作了有关这方面的报告。看来我的报告还不赖，图宾根要了我。这样我于 1987 年转到图宾根大学，在那里
作了五年的教授。这是我的第一个教授职位。

问：您以后又写了很多有关思想史的论文，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上过这方面的课。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呢？

答：实际上对这个题目的研究，我在维尔茨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主要还是在图宾根，我到了特里尔以后，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我一开始是研究文学和美学，具体讲就是郑板桥、绘画、书法、诗歌。这些都可以归纳进美学这个大的范畴。但是，绘画、艺术、诗歌是不能孤立于其它哲学思想之外来研究的，所以我也一直将哲学考虑在内，而且越多越喜欢。在图宾根，我跟 Hans Küng 有了初次接触。他对伦理道德范围内的
超文化、跨文化以及文化间问题、跨宗教对话等等都很感兴趣。在那里，我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与欧洲、中国与西方文化对话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到了特里尔以后，我仍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992 年来特里尔以后，我首先将特里尔大学与武汉大学之间的校际交流继续进行下去，我也多次去武汉拜访。1997 年和 1998 年，我在特里尔举办了两届学术会议。一次
于哲学问题，题目叫“中西对话”，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是“社会的伦理学基础”。两次会议都有来自国外的重要人物参加。第一次参会的有余英时，张隆溪，第二次参会的有杜维明，刘述先。这些重量级人物能够参加会议，可以算是相当成功的会议。在图宾根的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一起翻译了《美的历程》这本书，我也邀请了该书的作者李泽厚到图宾根讲学。我到特里尔以后，我又一次邀请他到特里尔来做报告。

问：您转到特里尔的原因是什么呢？您在特里尔呆多久了？

答：首先是因为这个位子比原来的好，是个 C4 位子，人往高处走嘛。第二个原因是，特里尔离我的家乡更近。我来自特里尔附近的萨尔州。那个时候我的母亲还活着，如果能在特里尔工作，几乎可以说是回到故乡了。第三个原因是，当时在图宾根大学，我的同事 Tilemann Grimm（林懋，格林，葛林）退休了，为了找一个继任者，我们费了很大的劲。三次不同的聘任程序，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这让人非常头疼。我是在第二次聘任过程中得以脱身的，我很高兴能够摆脱此事。上述这三个原因促成我转到特里尔来。我 1992 年来到特里尔，到现在整整 20 年。我已经退休两年了，在特里尔任职是 18
年。

问：特里尔的汉学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答：特里尔汉学系一开始能有乔伟教授作为创始人，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我来之前

，乔先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把这里的汉学系已经建设得非常好了。在此基础上，我可以较为轻松地继续工作下去。最开始的时候与学生存在很大的问题。虽然我已经在聘任过程中过五关斩六将得到了机会，但是学生们认为，我会只搞古代中国的东西。尽管我都已经收到聘任书了，学生们还是给我写信，建议我不要接受这个职位，这使我非常苦恼。我不想一来到这里就跟学生没有良好的关系。所以，我首先跟学生们谈话，向他们解释，我其实是赞成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两个方面都做的。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我虽然更喜欢古代的东西，当然也认为现代很重要。学生后来没有再继续反对，我想他们是接受了我的看法，或许他们也学会了欣赏我的观点。当然，到底是不是这样我无从知晓，也没有人告诉过我。

问：只是特里尔汉学系偏重现代中国，还是当时整个德国的汉学专业都想从古代转向现代？

答：我认为当时正是一个转折时期，古代中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处于前景地位了。乔先生在特里尔建起了一个以现代中国为主的汉学系，当时的专业也称之为现代汉学。但乔先生也还是做了古代的东西，他也总跟学生阅读新儒家的文章和类似的故事。当时甚至有个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免修古典课等等。对大部分学生而言，古汉语太多了，他们不想对此感兴趣。我试图告诉他们，中国不只是一段短短的现代历史。如果要阅读比较高深的文章，总是会碰到一些古代的典故及名人引语等等，即使只读报纸，也绝对离不开古代汉语。

问：您能讲讲学生人数在过去 20 年里发生变化的情况吗？

答：学生人数的变化非常大。我是 1992 年来特里尔的，这是“六四”（1989 年）以后的

第三年。以前每年新入汉学系的人数可以达到 90 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得到了

图
宾根的工作位子。“六四”以后第一年，新生人数一下子降到 9 人。80 年代乔先生在特里尔的时候，新生人数大约 40 人，92—93 年冬季学期，新入校学生人数只有 4 人，降

到有史以来最低水平，其中三个不久之后也放弃了汉学，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

Kuhlmann,

他现在已经博士毕业，在 *Monumenta Serica*² 工作。后来由于奥运会的缘故，学生人数

上
升，但是接着又降下来了。这都是因为政治、经济波动的原因。

很可惜，中国的形象在这里非常不好，很负面，有点儿超负面，而且可以说是很具缩减性。也就是说中国形象只缩减到几个在媒体中多少起点儿作用的方面了。这就导致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没有那么多。中国在我们的媒体中，却总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努力通过我的报告来使这种倾斜的图像重新得到矫正，回归到中国

²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华裔学志》）：是一本国际性的汉学学术期刊。现时由德国华裔学志研究中心（*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在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发行。该刊把中国文化历史的遗迹介绍给西方人。《华裔学志》杂志从 1934 年由北京辅仁大学汉学家鲍润生担任主编，当时的辅仁大学校长陈恒（1880-1971）十分重视这份刊物，并为之定名为《华裔学志》，一直沿用至今。

真正的形象上来，即使只有一点点的改变，我也绝不放弃。

问：您认为中国在媒体中的倾斜图像，只是跟德国媒体有关还是跟中国本身也有直接关系？

答：当然，这也跟中国有直接关系，跟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我们这里并不是以其完整的形式而被认知的。这里的媒体报道，只把焦点限制在有限的几个关乎政治的方面，比如人权问题、法制问题，目前还有大家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德国也是一个经济强国，而中国则是被当成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来看待的，而且是一个不按我们的游戏规则出牌的竞争对手。

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叫 *Hart aber fair*³（残酷但是公正），主持人是 Plasberg。那里传递出的是一个完全扭曲了的单面中国形象，因为参加讨论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关于中国的讨论，至少应该有人能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去谈论吧。总是只有那些批评中国的人被聚集在一起谈论中国，他们的谈话方向只能有一个。通过这种方式，不可能产生完整的中国形象，也只能被限制在那几个我们认为重要的方面。

问：您认为，德国的汉学专家为改善中德两国之间的理解做得足够吗？

答：我觉得不够。这一直是一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仅从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这一方面就可见一斑。我刚刚听说，一位波鸿大学的同行罗哲海（Heiner Roetz）写了一篇有关德国汉学界是“同伙”的文章⁴。他这里所说的“同伙”意思是指，德国的汉学界让自己成为中国政府的同伙，是中国政府思想意识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想，他所认为的中国政府是毫不考虑人权等类似事情的犯罪集团。这样就在德国汉学界内部引发了一场讨论。我觉得，在德国人们所看到的、所知晓的就是艾未未、廖亦武或者刘晓波这几个中国人，而那余下的十四亿中国人，却基本上被忽略不计。而这几个政治异见者所传递的，当然只是一种视角。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缩减主义”。整个中国完全被缩减到这一个方面，这样当然无法呈现真实完整的中国形象。

问：在德国《明镜周刊》⁵上曾有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学生都是间谍”。

答：对，正是这样，都是类似这样风格的报道。试想一下，廖亦武，他旅居德国大概也就一年吧，可是马上就把我们所能给的最高奖项⁶颁发给他，而他的故事甚至连真实性这一点都谈不上。但是这些政治异见者，他们当然也知道，我们的街道上到处铺满了黄金，他们来这里不会白来。当然，如果谈起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就没个完了。

问：德国对其它国家，比如非洲、南美洲的国家，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吗？还是

³ *Hart aber fair*，是德国电视一台的一个栏目，其主持人为 Frank Plasberg。该节目从 2007 年 10 月 24 日开始播出，每周三晚上 21 点 45 分播出，时间长达 75 分钟。

⁴ 这里指罗哲海的下面这篇文章：Heiner ROETZ (2011): Die Chinawissenschaften und die chinesischen Dissidenten. Wer betreibt die „Komplizenschaft mit der Macht“? 载于: Fakultä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 der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Hg.):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35/2011 (Themenschwerpunkt: Dissens in China)。

⁵ 这里指《明镜周刊》2007 年第 35 期上刊载的一篇题为 *Die gelben Spione – wie China deutsche Technologie ausspäht*（黄色间谍 – 中国是如何刺探德国技术情报的）。该文作者为 Jean-Pierre Kunkel。

⁶ 2012 年德国书业和平奖。

只对中国这样？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总是提到我们的媒体报道太片面了。就拿巴勒斯坦问题来说吧，那里对人权的侵犯、被强权占领等等问题是何等的严重。本来那里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地方。诚然，由于德国过去的历史，没有人敢涉足此处，这个问题太敏感了。由此可见，我们所谓的“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事务”其实根本就谈不上全球性。我们有选择地关注某些国际问题。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和平而努力奋斗，为放弃对该地区的占领而奔走呼吁，如果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那我会非常高兴，而不是什么达赖喇嘛，什么刘晓波之流。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授予那些为确实需要和平、而和平又难以得到地区的和平努力奔忙的人，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和平奖。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事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发生。我们不是有中国吗？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地区，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发泄我们的人权良知。

问：那您认为，德国的媒体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一句话就能简单回答的。首先应该注意，德国高度重视新闻自由，在新闻报道中也习惯于批评自己的国家与政府。这种习惯也表现在对其它国家的报道上。你看看，我们有多少关于美国前总统布什的负面新闻。如果布什只想看到有关他的正面报道，那么他肯定每天都是铁青着脸。但我相信，布什肯定对此无所谓，因为他所关心的是美国的强权地位，在他看来，媒体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美国只需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即可。

我们的媒体专业人士所信奉的金科玉律是：“坏消息才是好新闻”。从这一点来看，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对于媒体界来说就是好新闻。总体而言，西方记者所热衷的是诸如人权、民主、新闻自由等话题。如果他们看到某个国家的真实现状与其固有观念不相符合，那么他们的报道就是负面的。在德国，这当然也与纳粹时期有关，这种习惯也导致某些记者与政治家，尤其在此类问题上表现出过多的说教与历史使命感。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一直摇摆于正面与负面两个极端之间。现在则是两种形象有所交融：总体来看以正面报道居多，但由于受自身政治利益的驱使，有时也表现出较多的负面。其次：媒体也必须顾及自己消费者的预期。《南德意志报》或《明镜》周刊的读者总是喜欢读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因为顾客已为此买了单。这些报纸的中国新闻报道员，也就服务于一个带有特定期望的市场。但遗憾的是，其报道时常有失公允。

此外，人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受到自身文化、政治倾向的影响。我经常引用一句犹太箴言：“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只看到我们自身。”换句话说，德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映射的是德国自己的政治倾向，他们所说的，往往并不代表中国的真实情况。再次：我认为另外一个观点也很重要，而这与西方的自我理解格格不入，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能公然说出来的：西方（也包括德国）媒体几乎疯狂地追捧一些政治异见者，他们是媒体的宠儿；如果能在西方获得一个异议人士的身份，他们在当地就会赢得极高的关注度，也许几年之后他们就能获得很多资助。有些人因此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想弄到这种标签，比如 2009 年法兰克福书展，邀请了从

美

国来的贝岭。据我所知，贝岭是在 1988 年前往美国并待在那里的，好像拿的是美国护

照

。那么，一个美国公民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的言论，能不能因为他曾经是中国人，就被

冠以“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这确实是一个根本上的问题。还有，廖亦武，2011年夏天他才得以来到德国，一年以后就授予他最高文学奖“德国书业和平奖”，就因为他发表的一些有关出版物而被当成“持不同政见者的楷模”。他本人在颁奖仪式上，也借机极力抨击中国，因此赢得在场德国知名人士的热烈鼓掌，其中也包括德国联邦总统高克。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西方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其父亲被当作是一位中国的异议诗人，在我们这里可以随意读到他的简历。这其实是非常滑稽的：诗人艾青，其实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士兵，只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像其他所有知识分子

一样，被下放到边疆地区。1978年获得平反以后，转而成为一名文学领域的保守派，比如在对待当时新兴的“朦胧派”诗人北岛等人的态度上采取较强硬的立场。中国的作家与艺术家们深知，如何才能西方国家获得大笔资金：没有什么比其著作（或艺术作品）在中国被禁更好的了。而西方译者或赞助商也深谙此道，这使得中国作家或艺术家在西方社会的知名度随之提高，从此他们便走上了一条金光大道。然而，德国媒体对这些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恩宠，偶尔也会受到讽刺，不过讽刺得也许太少，讽刺歌曲创作者 Funny van Dannen 的那首“中国持不同政见者”⁷就是最好的例证。

问：您认为德国的汉学家，在改善中德、中西相互理解方面做得不够。那么，他们为什么做得不够？

答：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做得不够。我认识足够多的同行，他们有跟我相似的观点，只是他们难以在媒体找到倾听对象。那些不断在媒体抛头露面的人不是我们，我们在德国公众面前不起任何作用。那些在媒体中有一席之地的是像罗哲海（Heiner Roetz）这样的人，他们对中国持谴责批评态度。这样的人时不时地可以在电视上出现，他们懂得如何利用人们的期望，电视台当然不希望邀请那些质疑人们期望的人。就说“残酷但是公正”这个栏目吧，被邀参加论坛的一共有六个人，唯一一个对中国持有正面态度的，是那位击剑手 Britta Heidemann。可她几乎没有机会说话，也没有特别大声地争取发言权

。那些有望更正人们对中国偏颇形象的人，在这样的节目当中根本就不被派上用场。

我们的媒体总是同一个声音，同一个方向。在这种情形下，无论你写多少，说多少，做多少报告，都不管用的。我做报告的时候，当然也有自己的听众，但那是很有限

⁷ 歌词大意如下：（第一段）我想找一个永久的笔友，他尽可以是同性恋，但必须很敏感，他的兴趣不能只是爱穿、爱玩儿、爱今天的音乐。他尽可以来自第三世界，一个无人知晓的国家。但我最想要的还是一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第二段）我觉得中国魅力无穷，那里人口众多，可惜都没有自由，哦哦哦。我不是里根，我不说：“城墙必须拆掉，但人权到处一样。”我觉得中国无与伦比，那里有古老的文化，很难的语言，他们不是偶然发明了瓷器和火药，那里蕴藏着一股疯狂的力量，我们现在用 Z 来代替，但你立即可以看到，他就藏在 Potenz 这个词里。是啊，词语是我的东西，没有了词语我什么也不是，没有了电子邮件我无法生活。可是至今我还没找到真正的伙伴。（第三段）因此我想找一个永久的笔友，他尽可以是同性恋，但必须很敏感。他的兴趣不能只是爱穿、爱玩儿、爱今天的音乐。他尽可以来自第三世界，一个无人知晓的国家，但我最想要的还是一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原文歌曲：http://www.youtube.com/watch?v=uacuzj3X_Og。

的。关于中国，我们国家有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重心，认为这样才是正确的。而我呢，却试图对这一点提出质疑，这恰恰是我们的“政治正确性”不感兴趣的地方。

问：德国的汉学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真正为改善东西方理解作出很多贡献。那您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提高东西方理解方面做得够吗？

答：我想，他们不太有机会改变什么。因为，这里人们的看法完全建立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偏好之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想改变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他们可以试着将中国的正面东西展示出来，比如说在脱贫致富方面所作的努力等等，但是这里的人们更愿意听的是其它的东西。

问：您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联系。除了刚才有关两国理解这个题目以外，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看法吗？

答：这可是一个好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有无可能就此问题作一个概论，因为有太多太大的差异。但也许有一点可以概括出来，那就是，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殖民时代所带来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浩劫以后，他们对重建中国有很强烈的兴趣，他们试图将西方与中国以某种方式有意义地联系起来。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人们认为“越西化越好”，“五四运动”时期人们说得更多的是“扔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包括中国的文字，也要像垃圾一样扔掉。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认为这一点至少已经是非常正面的事情了。现在的情况是，“西化？行，但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的意识，认同自己传统文化价值的意识，在知识分子当中普遍提高了。

问：刚才我们说到学者这个话题。您在汉学系的学生中，只有德国学生呢还是有来自其它国家的学生？

答：我们现在也有中国学生，这是近五六年来的一个变化。近几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汉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当然也为我们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专业，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汉语语言知识的学习，而这些他们已经有了，不需要再学了。那么我们如何组织安排我们的课程，成绩单方面怎么要求等等，才能使汉学专业也成为中国学生的可学专业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问：就学习习惯而言，德国学生与中国学生有什么不同吗？

答：那当然有。这些中国学生非常努力，学习很有劲头，跟我们德国的学生完全不同。我得说，对我们的学生我比较失望。幸好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我刚刚在法兰克福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结束以后我跟韦荷雅教授（Prof. Wippermann）、阿梅隆教授（Prof. Ivo Amelung）一起去吃饭，席间大家说起这个话题，他们跟我的看法完全一样。德国学生，可以说也许最多只有 20%是有学习动力的，其余的人几乎可以忽略。这样的学习态度，本不应该来上大学的。不仅如此，在基础知识方面，他们也很差劲，即使是很普及的知识，他们也不懂，这样你就必须总是从头开始。我们学生的这种状况实在难以令人满意，我觉得，他们的学习态度太差劲。当然也有一些学生，很有学习动力，为他们工作，值得。

问：中国学生，由于他们早已养成的学习习惯，在课上常常比较沉默，不太喜欢发言。这样课上就有不同的学生，有的比较沉默，有的没有学习动力。那么，老师上课的时候，如何鼓励这些有不同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的学生继续学习呢？

答：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学生的问题常常在语言上。我们的课如果不是汉语语言课的话，都是用德语上的，而大部分中国学生的德语不够好，再加上他们本来就不太喜欢发言，所以课堂上就更加沉默。德国学生喜欢说话，喜欢发言，但是知道得却并不多。中国学生却恰恰相反，他们知道得很多，但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干脆不发言。

问：您刚才说到，特里尔大学与武汉大学是姊妹学校，两校之间的交往多吗？

答：是的。我们与武汉大学的校际交流是从乔先生开始的，因而可以说是有一段历史了。我呢，也一直努力将两校之间的交流持续发展下去。我们每年邀请一位武汉大学同事前来特里尔访学，为期一个月。这是一件很受欢迎的事。曾经有一些著名学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过特里尔，比如刘纲纪、郭其庸。目前张洁正在特里尔。我们每年派送两名学生前往武汉大学学习，武汉大学也有学生来我们这里学习。现在我们跟厦门大学也建起了校际交流，双方关系也发展良好。

问：除了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学者以外，还有其他人来过特里尔吗？您也在中国讲过学吗？

答：我们这里也来过其他大学的学者，但那都是偶然情况。我作为客座教授到过武汉，其中一次为期一个月，还有一次为期两个星期，我刚刚在上海复旦大学做过三个星期的客座教授。

问：您跟台湾也有交流吗？

答：我跟台湾有一点联系。我跟中央研究院有过联系，我曾经邀请李明辉、刘述先来此，我也在台湾参加过大型学术会议。最近一次去台湾我想是在 2001 年，那是去参加一

次大型汉学会议，是中央研究院组织的。不过自此以后我没再去过台湾。我很想再去，毕竟我在那里留过学。

问：您前面说过，当您来到特里尔的时候，学生担心您会只讲古代中国。那您在课程设置、课堂计划方面是如何做到古今兼顾的呢？您都上过哪些课程？

答：我曾有规律地上过有关现代中国历史的讲座。我也上过有关现代题目的讨论课，比如现代文学、现代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于现代，也就是说现代哲学，今日中国宗教等，这些都与古代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没有讲过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不是我的研究范围，我只是讲一些现存与中国、文化有关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中国历史传统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

问：您已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论文、书籍、翻译等等不同形式的出版物。刚才您也提到您翻译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这本书。您能就出版作品这个问题再多谈一点吗？

答：我所组织召开的那两个会议，都编了论文集。其中一本叫《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思想》，是有关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哲学方法这个主题；另一本叫《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伦

理》这两本书都是我与另外一位哲学系教授一起编撰的，当时也得到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赞助。这两本书都是关于跨文化对话这个主题的。另外，就此题目我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做了报告。除此之外，我也就其它哲学思想方面出版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美学。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的论著，书名叫《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是顾彬（Wolfgang Kubin）关于中国文学史系列丛书中的第五卷，该系列一共十卷。我撰写的另外一本书是《中国介绍》（*China für Anfänger. Eine faszinierende Welt entdecken*）。

问：您译成德文的《美的历程》，也已被翻译成多种不同的语言出版，它们是从德语翻译成其它语言的吗？

答：据我所知不是。我想，英文版在先。不过，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德文翻译比其它语种的内容要多，甚至比原文还要多。因为我们为李泽厚书中的所有引言、名家都作了详细注解，并加注了引言出处，而李泽厚自己却没有做，英文翻译也都没有。我们的德文翻译有很多脚注。

问：儒家思想一直是您研究的兴趣所在。关于这个题目您也作了多场报告，写了多篇文章。您认为什么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或者说您对什么最感兴趣？

答：对我影响很大的是杜维明的书。在我看来，杜维明让儒家思想中长期失去光泽的一面又重新发光闪耀了，那就是：儒家思想不只是一种智慧的传统，而且也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标准，它也是一个几乎精神的传统，那就是强调修养——修身养性。这基本上可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不是那些有关等级社会、歧视妇女等方面的论述。有关等级社会的思想固然属于儒家学说的一部分，但这种形式现今已经不需要了。儒家学说不是是一座教条式的建筑，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动。它是丰富的文化资源，人们当然可以提出问题：儒家丰富的文化资源对我们今天而言，哪些是有趣的、重要的？哪些是可以被遗忘的、摒弃的？儒家其实并不比前现代欧洲的基督教更加歧视妇女。在欧洲的前现代时期，妇女也同样没有任何地位。无论你看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前现代时期都是以男人为主。男人有更多的肌肉和强健的体魄，他们去战场作战，那时的社会是以战争为导向，当然也就以男人为导向。而如今，没有人想要战争，因而以男人为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在研究儒家思想的时候，仍然以“儒家等级社会、歧视妇女等等”为主，那基本可以说是偏离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中，还有其它实际上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中国就有一位女士，叫于丹，她在电视上做了一个节目非常流行。关于儒家思想，她写了一本书⁸，在五年以前就已经卖到1000万册。这是多大的一个成功啊！简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

的书籍之一。现在都有德文翻译了，其它语种的翻译也有，更不用说英语了。人们不禁要问，原因何在？当然，也有专家对此嗤之以鼻，他们说，这是对儒家思想的简易化、简单化。诚然，这确实是对儒家思想的简化，但这并没有影响如此众多的人们对它的喜爱和迷恋，她的成功只能证明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

问：这也说明，很多人依然对儒家思想有所认同。您认为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依

⁸ 这里指《于丹〈论语〉心得》这本书。

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吗？

答：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一方面，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学说，被人重视、研究，有各种学派出现，但是规模范围还是太小，从这个角度讲，儒家思想所起的作用还相当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下意识作用于人们思想的定位模式和价值体系来看，我认为它还是依然存在的。在我的文章和专著中，我把它称为“后儒家价值体系”。儒学作为一种机构，已经随着封建帝国的灭亡消失了，但是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比如如何看待家庭，如何对待老人长辈，如何对待师长等等，儒家思想还是起着很大作用的。曾经也有一位懂行的人告诉我，就是那些高级官员、高级干部，他们的头脑中，依然存在着儒家思想的秩序观念，他们也从儒家的角度来思考。从这个角度讲，儒家思想的作用，更多的还是无意识的。儒家思想还是一直在起作用。杜维明，是一位很多人都知晓的人物，知识分子都知晓的人物。现在他离开哈佛前往北大，这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自然，也有很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对儒家思想持批判态度，因为他们还延续着“五四”的传统。因此，在当今中国，儒家思想呈现出的是一个多样的画面。

问：中国近阶段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从根本上开启了对儒家的重新评价。您认为，儒家、经济与政治三者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答：儒家、经济与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近三十年来一直受到人们关注。这首先与其它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是分不开的，比如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等。在欧洲，对资本主义经济最流行的解读模式是马克思·韦伯⁹在一百年前所作的描述：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受新教伦理的支配，尽管不是自愿这样。就是说，韦伯将宗教及价值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尽管教廷在西方已经走向没落，但后基督价值仍大行其道。同样的关联也可以在东亚国家找到，儒家思想发挥着与新教伦理同样的功能。准确地讲，在中国与东亚必须谈到后儒家，也就是说，其价值系统（比如次生道德：勤奋、节俭，为后代着想等）在1911年“打倒孔家店”之后在民众间依然充满活力。

问：您对中国的儒、道、佛三家都很有研究。您认为那一学派对您影响最大？

答：由于我长期研究汉学，当然也就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不能说，儒道佛三教中哪个更好。我的想法是，三教所蕴涵的智慧在生活实践中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比如在不同的生活阶段或时代，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贡献。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毫无例外地强调“三教合一”。笼统地讲，我认为“中庸之道”这句箴言对于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还是很有意义，且富有裨益的，尽管这种观念在时下被认为是非常“传统”与“守旧”的。

问：自2002年开始，您是 Académie du Midi (Institut für Philosophie e. V.) 这个协会的主席。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这是一个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协会，致力于跨文化方面的研究。协会

⁹ 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德国学者，其经典著作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007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一位名叫 Günter Wohlfahrt（沃尔法特）的同事发起的，他曾经是德国乌珀塔尔大学的

哲学教授，是一位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教授，是阿多诺（Adorno）和哈贝马斯（Habermas）的学生。后来他发现了东方，发现了中国哲学，首先是佛教的禅宗和道教以及道家哲学，这使他非常着迷。他后来完全转变到了这个哲学阵营，只研究东方哲学，就此著书立说，而且用东方哲学的眼光来批评西方哲学。他发起成立的 Académie du Midi，成员每两年在法国南部聚会一个星期。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聚集在那里讨论，有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有研究汉学、日本学的学者，当然也有研究哲学的学者，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讨论问题，每次讨论都有一个跨文化的主题。后来我们将这种聚会发展成为学术讨论会，并将参会论文汇集册，出版发行。

每次聚会都很愉快，不只是因为那个地方环境优美，能给人以启发与灵感。Midi 的意思就是法国南部，所以这个协会可以称为“南法学会”。自从我退休以后，协会的主席由 Hans-Georg Müller 担任，他也是一个在爱尔兰工作的德国人。现在加入这个协会的

也有很多美国人，有汉学界的名人，比如说 Henry Rosemont, Jr. (罗思文)， Roger T. Ames (安乐哲)，他们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他们可都是汉学界的名人哪！

问：跨文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人们谈论的重点话题，您也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研究。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您是怎么理解“跨文化”这个概念的？

答：我想谈谈“大文化”，因为这对一位人文科学工作者来说当然最具吸引力；但我也对富有生活气息的日常文化深感兴趣，这可以从人们的日常行为举止方面折射出来。因此我相信，日常文化同样带着“大文化”的烙印，尽管大多数人对其影响已感受不再强烈。例如，尽管现在很多西方人根本不再进教堂，但其人生观、价值观仍然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在中国，儒家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同样根深蒂固。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现代媒体作用的不断加强，人们的世界观与行为模式自然而然地被逐渐“西化”，而“西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但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反全球化运动，即区域化。这就意味着，人们也总是愿意接受与其自身文化相符的东西。

问：在跨文化对话过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中德双方在哪些领域进行了对话？

答：关于“跨文化对话”这一话题尚存许多争议，有些甚至是自命不凡却毫无实质内容。因此，首先要问：应该在何处以及哪些人之间开展对话，如何对话才能成效显著？不过，“对话”这一概念不能狭隘地去理解，而是应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即：为了理解而努力。对话首先是不同人际行为之间的对话，这就是说，我们周围需要“他者”，以使我们作为“自己”来体会世界。在这一点上，文化也同样如此，只有当人们在对照异域文化时，才能更好地体验自身文化。如果我开始学习一门外语，则首先要考虑到我的母语。从这一点看，跨文化对话应当是尽可能地去理解对方，而这种理解存在于一切可能的情况之下：个人之间，政治家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媒体之间（比如脱口秀等）。这样的理解首先需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德之间几年前就已开始举办“法制国家对话”，这是前总理施罗德力主的，以期帮助中国建立起公民法体系。但必须注意，这样的“对话”不能演变为“独白”，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一方像老师一样讲、另一

方像学生一样听是不行的。

问：您主持过不少项目，您认为哪些是特别有意思的呢？

答：我觉得跟媒体专业的同事 Hans-Jürgen Bucher（特里尔大学媒体专业教授）合作的

一个项目非常有意思，是有关中国互联网这个主题的。我们研究了中国互联网的文化特点。互联网本来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媒体形式，那么西方的媒体是如何中国化的，是如何从文化方面入乡随俗的。我们追踪了一系列问题，也组织了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会。

当时参加这个项目的还有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中国同事，叫方维规，他现在已经成为北师大一位有名的教授。他是仅有的几位在德国取得教授资格的中国人之一，是在艾朗根（Erlangen）大学取得的。

问：您还做过其它有意思的项目吗？

答：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跨文化交流的建立”，这个项目带来的成果就是，我们开设了跨文化学习班，目标群体是那些要去中国的科研技术人员或者工程师，可以说是赴华预备班。与此相关的就是《China für Anfänger》这本书的产生。这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项目。

问：关于中国的美学、唐诗您做了很多研究，写了专著与论文，您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达到什么预期？

答：我想告诉这里的人们，中国有着跟西方完全不同的美学传统。这一点，不只表现在艺术领域、绘画领域，也表现在文学、诗歌方面。在中国，诗歌在文学领域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我们欧洲，影响力最大的起初是戏剧，是希腊的悲剧，后来才是小说。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却是诗歌。那么，诗歌的魅力何在呢？中国的诗歌有一定的形式要求，翻译的时候，这些特定的形式就失去了，不存在了。会中文的人，当然可以理解并且欣赏原诗，阅读它带有特定形式的内容，欣赏它的内容美、形式美，那是多大的乐趣啊！我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西方读者知道，中国人的文学艺术审美观是什么。

同样，在我的另外两本有关文学理论以及美学的著书中，我讨论了中国文学中唐诗的标准，不断尝试去跟踪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比较作品，也不是文学理论比较，我是从哲学史出发，儒家的、道家的、佛教的、或者其它一些与之相关的思想现象出发，将这些丰富多彩的、完全异样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给德国读者。

问：那您认为唐诗有可翻译性吗？

答：当然有，我个人也在不断尝试翻译一些唐诗。问题是你如何翻译。作为翻译，你必须明白，翻译永远不可能达到原文所传递的，因为形式上的精巧你首先就达不到。就以对仗这个形式特点为例吧。汉语中比较容易产生对仗，因为每个汉字基本上就代表一个语言单位，可以用一个音节来表示。对仗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我们的语言中也有，但是跟其在汉语中的重要性却无法相比。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对联，有对联也就有对仗。但是，要想构思出很有品味、很有味道的诗句，那可是伟大的艺术。杜甫、王维、李白这些人，他们在诗作中所创作的对仗，当然也应该在翻译中被体现出来。我在翻译的时候，尽量通过使用短句、改变词序这些方法，以便在翻译中也能看到对仗的存在。但

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问：二十世纪初，“五四”时期，有很多的西方文学被翻译成中文。您认为，从中文翻译成德文的翻译作品多吗？

答：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国与西方的互知知识是非常不对等、不平衡的。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发生关系。他们试图向西方学习，而且越多越好。他们学习西方历史、哲学，将西方历史作为他们自己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在学校里，大学生要学，中学生也要学，更不用说来自我们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了，他在中国可是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但是，要想理解马克思，必须先读懂黑格尔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对两个世界都很了解。而在我们这里，西方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以外的知识，比如中国、日本、印度等，却是少之又少。这也正是我们成立 *Académie du Midi* 的宗旨所在，我们正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推动与其它世界的交流。但是这些活动仅限于协会内部，在公众社会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我们国家，中国哲学没有任何地位，甚至都没有被当成哲学来看待，中国古典文学几乎无人知晓。当然，现代文学已经开始有人读了，但也主要是廖亦武等人的东西，很遗憾。莫言也许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也会有人读。

问：近来也有很多现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德语，只是在作品的选择上也还是非常具有选择性。

答：是的，非常非常有选择性。

问：您认为，您为中国及中国研究这方面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答：我不认为，我所做的是什么大贡献。我所做的那点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我只知道，我不断地努力了。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促进中国与我国人民之间更好地理解，我努力了。为了介绍中国的美学与文学理论，我努力了。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中国文学的美之所在，以及人们的审美喜好等等，这些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了。《*China für Anfänger*》这本书，曾一度卖得非常好，我也得到了很多赞誉之声。为此，我非常高兴。

问：您对中国未来怎么看？您认为德国的汉学将会怎样发展？

答：对中国的将来很难预测。

我想，对于中国将来怎样发展，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很多在媒体露面发言的人是比较悲观的。他们说，中国的问题太大了，解决不了了。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也认为中国的问题很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解决问题，虽然也是一步一步地，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政治是什么？就是不断地解决问题。在我们这里也同样是这样的。你看，这里的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不就是解决一个一个新问题吗？中国也同样。中国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数量级的。中国有近 14 亿人口，他也就有相应量级的问题。而德国只有 8000 万人口，相比之下这只是一点点。因此，中国必须不断地解决

问题，让整个国家保持稳定。假如中国不稳定了，这将是一个灾难，不只是对中国也是

对整个世界。它的冲击波我们这里也会感觉得到，而且是非常强的，因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已经像齿轮一样紧紧地啮合在一起了。我们只能希望中国继续成功下去。

德国的汉学如何发展，这跟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当然也取决于，接下来中国如何被这里认知。如果中国继续这样被负面认知下去，汉学专业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因而也就会有较少的学生被吸引学习这个专业，或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能鼓励更多的人去认识、了解中国，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希望旅游业能够发挥自己的功能，让这里的中国形象能够有所改变，因为我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些曾经到过中国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跟没有去过的人完全不同。他们也说，我们这里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不是中国，只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希望，旅游业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认识方面，也能作出一点贡献。

金：您认为，德国媒体也会有所改变吗？我是指至少不再那么只有一面之辞，而是比较客观地报道吗？

答：我希望如此，但我无法预言，可惜我们也不能强逼他们这么做，这只能是自发形成的。既然如此，我们必须以道家的平和来面对了：是怎样，就是怎样。宁可无为，也不能太过，以致矫枉过正。

问：您肯定去过中国很多次了。您多久去一次？是因为学术会议吗？

答：我想至少一年一次，有的时候一年两次，有时候甚至一年三次。每次去的时间也不等。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并且将努力继续坚持下去。大部分是因为参加学术会议，但是我也总想办法能多待一段时间，这样我可以借机旅游，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国。

问：您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是什么时候？您在中国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答：第一次是 1981 年。我在中国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人接待“西方人”时的盛情与礼节，不过遗憾的是，在西方并不同样如此。

问：那您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变化吗？

答：当然，非常非常大。我想，在我们有关中国的形象方面，这一点也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观察中国已经 30 多年了，亲眼看着中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又如何继续发生着

变化。但是，我们的观察家和媒体总是只关注中国的现状，只把中国现在的情况与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进行比较。以这种方式比较，他们只能得出不太令人乐观的结论。诚然，中国是从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起点开始的，他们当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的水平，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就法律方面吧，必须考虑到，30 年前中国根本就没有法律，在这方面是零，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共产主义毛泽东式的执法模式，那根本就不能算是法律。那时没有民法，后来人们才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才开始建立法治系统。没有职业法官，没有律师。但是现在这些都有了。换句话说：即使法治事业没有达到我们国家现在的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他们在二三十年内所取得的一切，那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也考虑到历史发展，不能只简单地说，他们的水平不够我们现在的水平。大家必须看到，那里的法律制度是从零开始的；而我们的

法治体系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我们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罗马人的法律基础之上的。

我发现，中国现在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大家基本上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是不能从根本上对党的政权提出质疑，可以说这是一条红色警戒线。如果有人不厌其烦地对这条红线进行影响，那会招来麻烦。像刘晓波、廖亦武这样的人，他们就是对这个根本提出了质疑。当然，像这样的人，我认为，也只是极个别的。大部分人都顺应这个政治局势，努力争取得到最好的结果，这一点在我们的政治上却没能得到介绍。在我看来，中国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如果想到八十年代我们这里都在为中国欢欣鼓舞的时候，当时中国的人权状况比现在要糟得多得多，但那时候却没人谈论这个问题。当然，那些法轮功人士，自然是很遗憾。我根本就不赞同，有任何人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受迫害。但是，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是不是只要一提到中国，总要把这样的事情放在首要位置？

问：也就是说，中国也在不断变化，不断完善。在您看来，中国什么时候或者多少年以后可以达到现在德国的水平？

答：呵呵（笑）。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认为，这当然也是一个我们的水平如何保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水平也不可能一直固定不变。最近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一份研究报告出来，我没有仔细阅读过这份报告，我只看了标题。这份报告预测，德国经济到 2060 年将大幅下滑，经济实力甚至会退居墨西哥等国

家之后。当然，这些只是预测，也可能不会发生，没有人能肯定地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水平能不能长期保持下去。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在很多方面，我们不太努力，不是吗？跟中国的大学相比，我们这里仅仅刚够维持正常教学。就拿特里尔大学来说吧，州政府只能支付大学工作人员工资预算的 93%，另外 7% 必须由大学自己来想办法。

大
学怎么想办法的呢？如果有工作位子空下来，他们马上就将这些职位先冻结起来，停一段时间再雇人，或者干脆取消一些位子。我退休的时候，我的位子空下来了，他们就将这个位子空置一年。中国人对这样的事情肯定会说：怎么可能？！不可思议！

在这种情形下，受影响、受损失的只能是学生了。而在中国怎么解决？我刚刚从昆明回来。云南大学的校园变得太小了，他们就在昆明市郊数公里以外，建起一座大学城。不只是给云南大学，还有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大学和师范大学等，一共五所大学在这里建了新校区。这里有最好的设备配置、最好的基础设施，建造了地铁，有了所有该有的一切。中国就是这样给教育、给学校投入的。我们这里呢？紧缩，紧缩，再紧缩。

问：就德国的汉学研究这一话题，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答：目前德国的汉学有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基本上只关注现代中国。这样，学生对语言系统的掌握就得到了重视。这样做自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却因此留下一些空白。如果一代代汉学学生成长起来了，他们对具有几千年丰富文化历史的过去却知之甚少，这不是非常令人遗憾吗？因而我希望，汉学专业的设置，也要重视中国的过去，这是理解现代中国的基础。试想一下，一个日耳曼语言学者，他只了解现代德国，从没听说过歌德、席勒，更不知道康德、黑格尔是何许人也，那我们可能会说，他对德国的知识面太过

狭窄，应该增加对历史的了解，因为只有了解了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现代。中国也同样如此。所以我认为，专业课的设置，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两者兼顾。

问：您认为，高校从本硕连读改成学士一硕士的这项改革措施与此有关系吗？

答：当然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我认为，以前的汉学专业设置比较自由一点。虽然那时候也有规定的学制时间，但是大部分学生实际需要的时间要长一点儿，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高一点儿。我们这个专业跟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不一样，英语专业的学生开始学习专业课的时候，已经会说流利的英语了；而我们的专业，学生必须从零开始学起。我一直反对本科汉学专业只学三年。三年的是很难学完那么多东西的。很多国家都有四年的本科，比如在中国、美国等。反对四年本科者一直认为，他们的学校教育只有12年。可是

在我们这里中小学也在改成12年啊。因此我认为，三年本科的设置完全是一个错误，尤

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专业。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传授给学生语言知识，再加上在中国学习的时间，因为只在这里学习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还必须去目的语国家学习一年，才能更好地掌握运用所学的语言。

问：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学习汉学的人都有一个中文名字，您也不例外。您的中文名字卜松山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含义吗？

答：我的名字“松山”是我从中国诗歌中挑选出来的。“松”是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树种，在严冬时节仍然坚定挺拔。而“山”，比如在陶渊明的诗歌中，也象征着坚定甚至仁爱。《论语》中有句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名字。